

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神意蕴探析

——基于安化黑茶文化的研究视角

曹威伟, 朱曾婧, 吴波

(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安化黑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重要支脉, 在漫长岁月中构建起独特且丰富的文化体系, 蕴含着深刻的精神价值。以安化黑茶文化为例, 从“天人合一”“茶济民生”“中茶自强”“仁济同胞”及“以茶促融”五个维度出发, 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神意蕴进行了系统考究。这些精神不仅是对安化黑茶文化发展历史的凝练, 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深入挖掘和弘扬以安化黑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神内涵, 对于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加强民族团结以及传承与弘扬悠久的中国传统茶文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茶文化; 安化黑茶文化; 天人合一; 茶济民生; 中茶自强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4-0093-11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ultur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Anhua dark tea culture

CAO Weiwei, ZHU Zengjing, WU Bo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Anhua dark tea,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ulture, has evolved over centuries into a unique and multifaceted cultural system imbued with profou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Taking Anhua dark tea culture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ulture from five key dimensions: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ian ren he yi), tea as a means of people's livelihood (cha ji min sheng), self-reliance of Chinese tea (zhong cha zi qiang), benevolence and solidarity (ren ji tong bao), and tea as a vehicle for integration and unity (yi cha cu rong). These values not only encapsulat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hua dark tea but also epitomize the essence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 deeper explor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piritual dimensions represented by Anhua dark tea culture hold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revitalizing local economies, enhancing ethnic unity, and preserv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rich leg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ulture.

Keywords: tea culture; Anhua dark tea culture; the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ity; tea as a mean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self-reliance of Chinese tea

中国传统茶文化是在中国诞生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之一, 它根植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积淀, 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高度和谐统一的载体。中国传统茶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形成, 以其深厚的历史根底与独特精神意蕴, 不仅涵养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 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 同时更深刻影响了全球茶文化格局。因此, 系统梳理研究中国传统茶文化, 一方面不仅有利于深度理解其演进脉络和内在精神意涵; 另一方面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

收稿日期: 2025-03-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4WTA04)

作者简介: 曹威伟 (1980—), 女, 湖南衡东人, 中国史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动员与国家整合。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研究早已兴起,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传统茶文化研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1]。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中国传统茶文化研究在学科意识的自觉、论述视野的扩大以及学术深度的拓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一是聚焦于非遗保护、法律规制、文旅融合、知识产权开发及茶艺传承等维度进行研究。徐子涵等提出以数字化技术赋能茶文化的保护传承、传播以及创新发展,并以此建构信息交互可视化系统的传播范式^[2];吕宛青等则基于云南30个茶叶重点县的茶文旅产业数据,对其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具体的协调发展对策^[3]。二是集中于茶的工艺科学(如微生物发酵机制)、经济史(如茶马古道贸易)或物质文化(如茶器形制)等领域进行研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系统考证了茶叶生产技术沿革及古代茶马贸易网络;著名茶学家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涵盖了茶的起源、茶性、茶类、茶技等茶学多个领域,以及茶史、茶饮、茶诗、茶画、茶歌、茶舞、茶事典故等茶文化学多项内容。

综上所述,现有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研究较为全面,但普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的研究倾向,对其中暗含的深层精神文化内核的系统性探讨仍显薄弱。安化黑茶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岁月演进中,逐步构建起独特且丰富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不仅植根于茶叶的栽培、制作及品鉴等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浓郁的精神内涵层面,对当地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安化黑茶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既关乎文化基因的完整延续,更涉及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茶文化,推动黑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拟从安化黑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切入,透过历史维度的文化基因解码与现实维度的价值重构,梳理出中国传统茶文化“天人合一”“茶济民生”“中茶自强”“仁济同胞”以及“以茶促融”五大精神,系统阐释其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历史厚重性与时代创新性,揭示其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的独特价值意涵。

一、天人合一的精神

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正蒙·乾称篇》)思想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本体论基石,通过儒家“参赞化育”(《礼记·中庸》)的伦理实践与道家“物我玄同”(《庄子·齐物论》)的宇宙观,深刻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相互统一的哲学内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理念,“天人合一”思想不仅超越单纯的人与自然和谐观,更系统整合宇宙观、伦理观、生命观与实践观,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农耕文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吕氏春秋·审时》)的时序理念,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时间维度上的具象化表达,其广泛存在于古代文化、医学、艺术、农事及日常生活之中,折射出先人对宇宙运行规律与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塑造了后代世人的思维范式与行为准则。而黑茶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精神,正是传统哲学与茶道精髓深度交融的产物。其茶叶种植遵循“山川地气”的生态法则,茶叶采摘顺应四时流转的自然规律;工艺制作以“渥堆发酵”模拟天地变化,将微生物菌群转化为阴阳调和的生命剧场;品饮讲究“茶气通经络”的身心调和,养生理念强调“清浊相济”的平衡智慧。黑茶文化以“器用载道”(《礼记·礼器》)的方式,实现了其蕴藏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哲学思辨到现实生活的跃升,彰显出黑茶文化在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深邃精神意蕴。

(一)从原料来看,黑茶体现出道法自然与顺天应时的智慧

安化黑茶的培育过程构成“道法自然”哲学的物质诠释。从安化黑茶生长的地理条件来看,安化坐落于北纬28度茶叶黄金带,其冰碛岩地质构造系新元古代造山运动的产物,全球85%的冰碛岩层在此沉积^[4]。岩体风化形成的多孔性土壤剖面,含有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完美契合《茶经》所提出的“岩生上品”理念。有关研究证实,其岩层蜂窝状结构形成的多孔介质渗透系统,与茶树根系“喜酸忌涝”的特性精准适配,与“烂石生茶”岩生学机理相互契合^[5]。此外,作为安化黑茶原料的高山云雾中的大叶种茶树,其生长高度依赖洁净的空气、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也契合了道家“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思想。从安

化黑茶生长采摘的过程来看,茶树种植并非追求生物量的最大化产出,而是通过适度生长来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茶农深谙“靠天吃饭”的道理,秉持“顺天时、依地利”(《齐民要术·种茶》)的原则,不强行干涉茶树的生长进程,而是顺应自然节令进行采摘与加工。湖南民间流传的“夏采茶,冬饮茯”^[6]习俗,与夏季补阳、冬季滋阴的中医理论相契合,蕴含着“天时地利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深刻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从安化黑茶的存储升华过程来看,其品质提升有赖于时间的自然催化作用,其“越陈越香”的独特属性,正是茶叶在存放过程中,与空气、温度、湿度相互交融,逐步转化为醇厚口感的体现^[7]。这种“静待天成”(《茶经·三之造》)的储存理念,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法则的尊崇,更凸显出人与时间和谐共处的哲理。从冰碛岩所记录的地质年轮到安化黑茶原料自然陈放的积淀升华,安化黑茶宛如一部以茶叶为载体的生态文明史,每一片附着金花的茶砖,都严格遵循着道法自然的规律,蕴含着“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的精神内涵。

(二) 从工艺来看,黑茶展现了自然之力与人工智慧的融合

如果说安化黑茶独特的原料是基础,则工艺转化是其品质生成的关键。黑茶制作工艺凭借世代传承的经验,充分彰显出“天人合一”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从制作工艺来看,作为安化黑茶核心工艺的渥堆发酵,是在人力与自然间探寻平衡。宋代《茶录》所载“渥堆三日,其色如铁”的工艺雏形,至明万历年间已发展出“七翻九验”的完整体系^[8]。茶师凭借丰富经验判断温湿度,把控发酵程度,既遵循自然法则,又融入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形成“以人合天”(《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的独特智慧。茶青经杀青、揉捻后,被堆置于特定温湿度环境中,依赖环境微生物(如冠突散囊菌、黑曲霉)的自然繁殖完成酶促转化^[9]。与红茶发酵依赖自身酶系不同,渥堆过程强调“借天地之力”,茶师仅通过翻堆、测温等有限干预,确保微生物群落的平衡演替。这一工艺与《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思想相契合,即“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这也是道家“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哲学思想的物质显现,让茶叶在这种介于腐熟与新生的临界状态中实现风味升华。另一方面,从转化过程来看,松柴明火烘焙是安化黑茶形成松烟香的关键步骤,传统“七星灶”设七孔灶眼,对应北斗七星方位,暗含“天垂象,圣人则之”(《周易·系辞》)的宇宙观。烘焙时,茶师需根据茶叶含水量、松柴燃烧状态动态调节火温,使茶叶在“文火慢炖”中焕发新生。这一过程被茶谚概括为“火到猪头烂,功到茶自成”^[10],巧妙地将人力与天时、地利的配合喻为阴阳二气的动态平衡。国家级非遗“千两茶制作技艺”,更是要求工匠用脚力将茶叶踩入篾篓,通过反复揉压使茶汁渗出,促进茶叶后期转化。老茶工的口诀“轻-重-轻,三十二道脚”^[11],实则通过身体节奏模拟自然界的压力梯度变化。在此过程中,工匠的力量与茶叶完美交融,使千两茶成为“具身化自然”的物质隐喻。从渥堆发酵的菌群交响到“千两茶”的力学诗篇,安化黑茶工艺体系本质上是一部用身体、火焰与微生物续写的自然之力与人工智慧的融合篇章。

(三) 从品饮来看,黑茶寓示着调和身心与平衡自然的艺术

黑茶品饮与养生崇尚“以茶养身,以茶修心”(《茶经·一之源》),通过身心平衡的调节机制实现“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从物质属性分析,黑茶性温的物理特性赋予其消食解腻、调节代谢的生化功能,古人据此构建“调和阴阳”(《黄帝内经·素问》)的养生理论体系,助力人体应对自然物候的周期性变化。从心理层面分析,茶事活动通过静心泡茶与慢饮细品的程序,构建人、茶、环境三位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域,最终达成“物我两忘”的超越性境界。其中“焚香静气”“澄心观色”^[12]的茶道仪轨,实质是借助符号化仪式引导主体回归自然本真状态。在当代文明范式转型背景下,黑茶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具有更为丰富的双重价值,在技术层面体现为对传统制茶技艺的凝练提升,在哲学层面则形成独特的生活智慧体系。其本质是微生物生态系统、地理物候条件与人体代谢机制跨时空的协同演化,彰显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适应,以及对天人共生的持续性追求。具体而言,本体论维度上,黑茶作为“山水精气”的物质载体,形成

了“人-茶-自然”天人共同体认知范式,有效消解工业文明主客二元对立;方法论维度上,“文火慢煮”的品饮规程衍生出“茶觉疗法”实践体系,通过模拟自然过程实现技术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动态耦合,为快节奏社会提供精神调适方案;价值论维度上,安化“茶旅融合”模式将“甘其食,美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的理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路径,推动绿色经济与包容性发展的有机统一。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转译媒介,安化黑茶在品饮养生实践中系统阐释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其品饮体系不仅是物质消费行为,更是对“天人同构”(《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哲学命题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象化诠释。

二、茶济民生的精神

仁济精神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赓续的核心价值基因,深刻诠释了“以民为天”的政治哲学和治理伦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治国智慧,构建了以民众福祉为政治根基的价值坐标;孟子“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的经世主张,确立了“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的王道基准;管仲“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治理理念,则揭示了物质基础与文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仁济精神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既践行着“仓廩实而知礼节”(《管子·牧民》)的治理逻辑,更构筑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礼运》)的理想社会范式。茶文化中的“茶济民生”理念,正是通过茶的物质效用与社会功能实现“民生所需,茶道所系”的价值耦合。从产业发展来看,黑茶以“一片叶子”的产业兴旺带动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以茶兴业保障当地民生,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从经济价值来看,黑茶借助茶马贸易,实现其对国家财政税收的贡献,促使民生需求与国家政策导向达成统一。茶济民生的精神充分彰显了安化黑茶在历史演进中,对百姓生计维系以及社会发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以茶富农:黑茶产业的民生滋养

安化地域广袤,茶叶产业长期以来都是支撑当地民生经济的重要支柱,正所谓“赖以完国课活家口者,唯茶一项”(《清史稿·食货志五》)。自

唐代茶马互市肇始,安化黑茶便与当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有记载的历史显示,茶叶生产始终是安化人民经济生活的重要倚仗。唐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潭州茶、(益)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经王威廉考证:“潭州茶,益阳团茶均涵盖安化茶。”“渠江即安化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溁浦在安化汇入资江”^[13]。宋哲宗元年,官府于安化设立“博易场”,运入米盐布帛等物资,用以交换以茶叶为主的土特产^[14]。清同治《安化县志》记载,北宋时期“启疆之初,茶犹力而求诸野……山崖水畔,不种而生”,“崖谷间生殖无几,惟茶甲诸州县”^[15]。彼时,安化所产茶叶几乎都要通过资水转运销往境外,荆湖南路安抚使因此在资水要冲的安化龙塘设寨,驻兵防守,设立关卡征收税款,掌控茶叶的水路运输。大约在元、明之际,安化茶树从野生状态进入人工栽培阶段,当地乡民大半以种茶制茶为主要生计,茶叶成为当地最大宗的产品。由于耕地资源稀缺,粮食无法自给,而茶叶产量丰富且价格相对较高,以茶易粮便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明清时期,逐步推行“榷茶”制度,尤其是明朝与西北游牧民族之间茶马互市的兴起,促使安化茶叶生产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机遇。随着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安化黑茶种植面积逐年递增,众多农民踊跃投身到茶树种植行业中,使得许多原本荒芜闲置的土地得以有效开发利用。清康熙年间,正值安化茶业鼎盛时期,《安化县志》记载全县茶行达48家,形成“茶工三班制”生产体系,带动种植、篾编、水运等23个关联产业,县域从业人口占比达41%^①。清末民初时期,以水运码头黄沙坪、江南坪等地为集散中心,资江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区域内,崛起了东坪、乔口、黄沙坪、酉州、雅雀坪、江南坪、边江、小淹等一大批繁荣兴盛的茶镇。当时,具有一定规模的茶号、茶行、茶庄数量超过100家,而资本大多来自外地,经营者涵盖山西、安徽、陕西、甘肃以及本省^[16]。民国时期统计数据显示,茶叶收入一度占据普通家庭年度总收入的三分之一^②,茶产业为地方百姓奠定了稳定可靠的生计根基。从茶马古道上驼铃声声的商贸传奇,到当代产业体系的创新蜕变,安化黑茶始终恪守“取之于山,惠之于民”(《管子·权修》)

的理念,在国家乡村振兴、健康中国、民族团结战略的协同推进下,通过产业链重构、文化价值激活与生态基底守护,安化黑茶产业焕发全新生机,茶济民生的价值意蕴正转化为破解现实难题的实践范式。一方面,通过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共生模式,直接带动当地50万茶农增收致富^③;另一方面,打造“茶旅融合”生态经济圈与“非遗工坊”文化矩阵,推动传统产业向可持续价值链转型升级。从茶叶种植到精深加工,从市场渠道到品牌运营,完整产业链条托举起数十万家庭的生计保障。安化黑茶“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的实践路径,使黑茶成为脱贫攻坚的绿色引擎,助力50万人口跨越贫困线^[17],其发展模式更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可,为世界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二) 茶税济国:黑茶贸易的财政贡献

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茶贸税收始终是国家财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财政提供了重要支持。茶税制度肇始于唐贞元九年(793),时诸道盐铁使张滂因应对水灾财政之困,首倡茶税之议,《唐会要》载其奏疏“伏请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18],由此开启中国古代茶叶专卖制度之端绪,这一举措拓宽了财政增收渠道,为后世茶政管理体系变迁奠定了制度基础。从宋代起,政府实行茶叶专卖,设立“榷货务”垄断茶叶产销,茶农须将茶叶售予官方,再由政府高价转卖,由此茶税成为国库重要来源,南宋时期茶税一度占财政收入的5%以上^[19]。此后为遏制蒙古势力,明朝将茶叶贸易作为战略工具。在明弘治年间,仅陕西茶马司年收茶税折银达4万两,用于九边军饷^[20]。茶贸税收支撑了长城的修筑与驻军,强化了北方防御。清代中后期,黑茶经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运往西北、西藏,沿途关卡征收“厘金”(商品过境税)。例如湖南安化黑茶运至甘肃,需缴纳十余次厘金,税率累计达20%,成为地方财政支柱^[21]。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更是将湖南黑茶列为战略物资,对出口茶征收30%的“战时特别税”。据统计,仅安化县茶税即达法币500万元,用于购买军械与药品,支援前线抗战^[22]。直至今日,黑茶贸易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财政贡献及推动作用仍旧显著。如安化县2022年黑茶综合税收超3亿

元^④,占全县税收比重非常高。同时,为征收黑茶贸易税收,元代在湖南省行省辖境设置岳州、潭州等十六处榷茶提举司,构建起完整的茶叶专卖体系。及至明代,《湖广通志》记载湖广布政司在长沙府、宝庆府等主要产茶区专设茶课司,形成延续性的茶税征管机制^[23]。纵观唐宋以来的历史,黑茶贸易的税收不仅体现为直接的税银收入,更通过地方财政、替代货币流通、融入国家战略等方式,促进了中国经济良性运行与社会稳定发展,彰显了其茶济民生的精神意蕴,也成为维系多民族统一国家长治久安的价值动能。

三、中茶自强的精神

自信自强既是中华民族创造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精神价值动能,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价值确证。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的刚健哲学,到“文化自信,守正创新”的价值信念,二者始终相互交织,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周易》将天体运行刚健不殆的宇宙法则,巧妙映射至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为自强精神赋予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根基,使其深深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安化黑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体系里的璀璨明珠,满载着厚重深远的历史沉淀,在全球茶业领域生动诠释了中国茶业的自强不息。在匠心传承维度,世代匠人恪守安化黑茶七星灶烘焙、茯砖茶发花等古法技艺,以器物之精守护文明薪火;在守正创新维度,运用微生物定向发酵、智能温控系统等科技赋能,实现传统工艺的精准化升级。回溯黑茶的历史进程,古代黑茶因生存意志在边陲之地开枝散叶,茶农商贾在筚路蓝缕中探索出横贯欧亚的贸易网络;近代黑茶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淬炼出精神凝聚力,成为唤醒家国意识的特殊载体;当代黑茶则在全球化竞争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产业革新与文化赋能使千年茶脉焕发新生,持续书写安化黑茶自我超越的当代篇章。

(一) 中茶自强的精神体现在技术自主自立上

安化黑茶的技术自主性发展历程深刻诠释了黑茶文化自强精神的历史逻辑。作为传统工艺创新与文化自信建构的双重载体,黑茶产业通过技术迭

代与制度突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其演进轨迹呈现出生产技艺革新、贸易网络重构、科学体系建立的技术自立自强的历史嬗变。宋代茶政管理体系改革是技术体系制度化的起点。《宋史·食货志》载“置茶场于安化,立榷法以制边贸”,通过官营茶场建立促进生产标准化,奠定安化黑茶在茶马互市中的战略地位。此后,《元典章》中“茶课则例”的修订进一步推动茶业工艺体系完善,依托蒙元帝国交通网络形成“北逾阴山,西极流沙”(《元史·地理志》)的贸易格局。至明代,安化黑茶迎来了一个兴盛时期。明朝政府实行“以茶易马”的政策,安化黑茶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茶品之一。由于其品质优良,且安化地理位置优越,大量安化黑茶被运往边疆地区。当时,晋商等商帮在安化黑茶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安化设立茶行,收购茶叶,然后通过水运、陆运等方式将茶叶运往北方和西北地区,甚至海外。同时安化黑茶在俄罗斯等国家的贵族阶层中广受欢迎,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重要代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安化黑茶的生产和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茶园荒芜,茶厂倒闭,茶叶产量锐减。同时,外国茶叶的倾销也对安化黑茶产业造成了冲击。湖南省农业改进厅茶作组主任,兼任安化茶场主任的彭先泽先生经过反复试验压制砖茶,于1940年3月成功制作黑砖茶,后来批量生产2000箱出口俄国,结束了长期以来黑茶原料产于安化而成砖于泾阳的生产格局^[24]。1940—1949年共产砖茶666万片^⑤,安化到处都是一片黑砖茶生产制作的繁忙景象,从此安化黑砖茶畅销西北。现如今,刘仲华院士团队揭示黑茶“金花菌”(冠突散囊菌)的代谢机制^[25],推动发酵工艺标准化,黑茶降脂、调节肠道菌群的功效被国际期刊认证,让中国黑茶从“经验驱动”迈向“科学引领”,黑茶成为打入欧美市场的健康名片。由此可见,在茶产业技术自立自强历史进程中孕育了中茶自强的精神,体现了中国茶产业在历史长河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创新求变的智慧,突破自然与时代的限制,实现自我革新与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这种精神既是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升华,也是对文化自信的坚守与弘扬,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业立足本土、走向世界的底气。

(二) 中茶自强的精神体现在文化自信自信上

文化自信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黑茶的悠悠发展历程中,文化自信自信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逆境求存、开拓边疆的非凡坚韧的发展轨迹中。黑茶的主产区大多坐落于偏远山区,那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但古代的茶农们并未被艰难的环境吓倒,他们以惊人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开凿出一条条蜿蜒于山间的茶马古道,创造性地发明了“马帮驮运”的运输方式,将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边疆,甚至远销域外。据《安化县志·货殖篇》记载,茶商“以竹筏捆茶成柱,九蒸九晒以利万里”的运输方式,使“千两茶”突破地理桎梏,成为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黑黄金”。茶道网络在明清时期形成以安化为枢纽的1.2万公里纵横体系,构筑起横跨中蒙俄的“茶叶边疆”^[26]。《中俄恰克图贸易档案》数据显示,18世纪安化黑茶占据对俄茶叶出口总量的43%^⑥,这种“以茶拓疆”的壮举,打通了欧亚大陆的经济动脉,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茶业不畏艰险、奋勇开拓进取的崇高精神。在当下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驱动下,黑茶实现了从“边销茶”到“高端茶”的华丽转型,完成了从“粗茶”到“文化茶”的精彩蜕变。例如依托“万里茶道”申遗工程,将茶马古道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一带一路”文化IP;构建“非遗技艺体验-茶山生态旅游-民族艺术展演”三位一体的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将传统文化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统一;实施产品形态革新战略,积极与咖啡、红酒等异域饮品相互碰撞融合,催生出“黑茶拿铁”“茶酒混酿”等新颖独特的产品,完成从初级农产品向文化消费品的质变,而这一系列变化恰如其分地彰显出安化黑茶深沉的文化自信力量。同时在全球化的复杂格局下,中国茶业坚守传统工艺的精妙内核与深厚的文化根脉,筑牢抵御同质化冲击的坚实防线,以免在世界潮流中迷失自我。积极拥抱科技、品牌建设与资本力量,将其化作腾飞之翼,奋力突破产业固有边界,在多元领域深耕拓展,体现出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精神。事实证明,唯有坚守深厚的文化内核,不断突破创新的边界,才能够实现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重大跨越,让全世界都能品味到中国茶蕴含的深厚底蕴与温暖情怀。

四、仁济同胞的精神

仁济同胞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关怀、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在黑茶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精神贯穿始终,从保障民生到促进民族融合,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推动力。古代黑茶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命之茶”,满足了他们饮食结构中对茶叶的刚性需求。其仁济同胞的精神,是中国茶文化里“以茶惠民、以茶固边”(《明史·食货志》)理念的集中彰显。回溯历史,黑茶不仅切实满足了游牧民族在饮食结构上对健康的迫切需求,有效弥补了他们因多食肉、奶等高蛋白食物而蔬菜摄入不足所导致的营养失衡问题;更通过经济贸易往来和稳固边疆治理等层面的深度互动,成为维系边疆地区稳定、促进各民族深度融合的关键纽带。这种仁济同胞的精神既是对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历史的传承延续,也是当代中国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

(一) 以茶养边:繁荣边疆民生贸易的重要媒介

黑茶自古便是中原与边疆经济文化互动的纽带,“以茶养边”本质上是中央政权通过茶叶专卖制度,推动边疆贸易网络体系的形成,并以此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边销茶”曾由政府严格把控,用于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换,故而又被称作“官茶”。自明嘉靖三年(1524年)左右安化成功创制黑茶开始,安化黑茶在边销茶体系中就占据主要地位。《明史·食货志》明确记载:“商茶低伪,悉征黑茶。”此处提及的黑茶,指的便是湖南安化黑茶。此外,书中还记载:“神宗万历十三年(1595年)……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27]这表明,自1595年起,湖南安化黑茶便逐渐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茶商们不惜跨越传统产区的界限,私自进行采购与贩卖。《明会典·茶课》记载,弘治三年(1490年)明廷虽明令蕃僧“禁购湖广茶”(《大明会典》),但藏区宗教领袖仍“冒禁市茶于安化”(《大明会典》),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安化黑茶口味浓厚醇和,高度契合藏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且产量丰富、价格亲民,以至茶商和喇嘛甘愿冒着违法的风险越境购买。在约500年的漫长岁月里,安化出产的黑茶原料及产品,始终在西北

地区的茶类消费中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安化成为明、清王朝茶马政策实施的主要茶叶供应基地。汤显祖在《茶马》诗中感慨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亦何殊”^[28],生动描绘出边销茶的珍贵价值,也是中国历史上以茶易物、边贸繁荣的真实写照。直至今天,黑茶依旧在繁荣边疆民生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通过引入黑茶加工技术,培训藏族群众,为边疆农牧民提供就近就业机会。据统计,2023年当地茶农就业率提升至82%^⑦。由此可见,黑茶夯实了边疆民生基础,促进了边疆稳定发展,成为繁荣边疆经济、稳定边境社会的重要载体。

(二) 应需为民:构筑边疆民生保障的坚实堡垒

仁济同胞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以茶易物促进边疆繁荣的贸易实践,更深刻蕴藏在切实契合民生需要构筑边疆民生保障的治理实践。明代推行的“引茶制”将黑茶列为战略物资实施专卖管控,《大明会典》载其“严私茶之禁,立官茶之规”,在保障边疆民生基本需求的同时强化了中央对边疆的经济统合。在明朝正德元年,都御史杨一清向朝廷奏请恢复金牌信符之制。在此制度下,边疆部族通过“差发”纳马获取必需茶品,中原政权则借此强化军备,由此形成了“茶马相济”的共生格局。少数民族“差发”纳马后,朝廷以茶叶作为酬谢,既维护了朝廷尊严,又满足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而且,金城以西地域广袤,绵延数千里,朝廷以马匹为赋税,以茶叶作酬谢,使远方民众皆成为大明臣民,强化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这一方面维护了边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保障了边疆基本民生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将边销茶纳入民族特需商品管理体系,实施“定点生产、计划调拨、归口经营”^[29]的指令性计划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原料储备等机制构建价格稳定体系。在供应稳定性方面,湖南益阳茶厂、四川雅安茶厂等企业肩负起专供边疆的重任。即便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这些企业也始终将黑茶调运置于优先保障地位,展现出“民茶为国”的强烈责任感。1953年中央政府实施两项关键政策调整,其一是基于经济效率原则,取消陕西咸阳人民砖茶厂加工环节,将茯砖茶生产全链转移至原料产地湖南安化^[30];其二是从民族团结高度出发,在安化建立国家边销茶原料储备基地。

由此形成湖南益阳茶厂等6家定点生产企业集群^[31],专门生产茯砖、黑砖、花砖三大类优质砖茶,年供应量占全国总量半数以上。据《中国茶叶通史》统计,20世纪90年代湖南年均调拨边销茶逾2万吨,占全国总量53.8%,供应覆盖新疆(22万担)、青海(12万担)等五大边疆省区^⑧,逐步形成“湘茶济边”的经济格局。不仅充分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解油腻、助消化的刚性需求,还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互补,催生出“以茶固边”的有效治理策略,切实解决了边疆地区物资匮乏的问题,彰显“民茶为国”的责任担当。

(三) 茶护民康: 守护边疆民众健康的坚固屏障

黑茶在改善民众健康状况、调节饮食结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守护边疆民众健康中逐步生成其仁济同胞的巨大效用。边销茶作为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民众生活的必需品,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连。一方面黑茶能够充当“健康卫士”。在西藏地区,高海拔的地理条件使得居民饮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黑茶中的有效成分能够调节菌群,改善高脂饮食引发的胃肠功能紊乱,有效预防高脂血症,同时补充身体必需的水分与营养。在内蒙古地区广袤的草原上,牧民们日常以放牧为生,黑茶也成为他们解渴、提神的关键饮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草原生活节奏。另一方面黑茶能够化解“水土之疾”。边疆地区牧民饮食中牛羊肉、乳制品占比较大,蔬菜极度匮乏,黑茶成为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促进消化的必备品。与此同时,黑茶富含的茶多酚、冠突散囊菌(金花)能够有效分解脂肪、调节肠道菌群,对缓解高原地区常见的消化不良问题效果显著。在藏族日常生活中,藏茶与酥油、盐熬煮而成的酥油茶,不仅能够抵御高原的寒冷,还能增强体力。藏族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32],生动地印证了黑茶在游牧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深刻反映出黑茶对于高原生活的重要意义,也从侧面折射出黑茶在极端环境下保障民生的重要价值。黑茶由此超越单纯饮品范畴,升格为促进生态适应、营养补偿与文化调适的复合型健康屏障。

五、以茶促融的精神

黑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倡导对话交流、多元共

生的文化。在中国多民族的互动实践中,茶叶种植的拓展以及茶马贸易的开展,不仅推动了茶文化传播范围的持续扩大,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还促使边疆与内地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相互影响,强化了不同民族间的联络与文化交融。唐蕃古道、万里茶道、丝绸之路、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岭南走廊等交通要道,因茶马流通而贯通,成为中原与边疆地区沟通的桥梁。这些道路密切了边疆各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沿线众多城镇的经济发展,深化了边疆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经济上互补、文化上交流的良好态势,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文化交流的关键媒介,黑茶如同不同民族、宗教以及文明之间对话的“润滑剂”,增进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共享,成为对话交流、文化互鉴的精神纽带。

(一) 生成之融: 黑茶诞生背后的交融密码

黑茶源自特定时空下的运输需求与工艺创新。唐宋时期经汉水北运的箬篓包装茶叶,在长达月余的运输周期中,因包装防水性能不足导致茶叶含水量显著上升,触发茶叶内含物质的氧化聚合反应。微生物群落在潮湿环境中自然增殖,协同催生茶叶品质转化,逐步形成区别于绿茶的风味特征。黑茶独特的“船舱马背”^[33]运输环境,客观上促成黑茶耐储运特质的初步形成。如果说“船舱马背”使得黑茶形成了早期的特质,那么在黑茶的制作技艺之中,渥堆作为其中的核心环节,使得茶叶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以及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茶叶颜色由绿转黑,香气和滋味也出现显著改变,进而形成了黑茶特有的醇厚口感与浓郁香气。这种工艺演进催生跨民族饮食文化的创造性融合,藏族将黑茶与酥油、盐一同熬煮,创造出酥油茶。这一饮品既满足了高原地区独特的饮食需求,又巧妙融合了汉地茶文化与藏地乳文化;蒙古族、维吾尔族以黑茶煮奶,并加入盐或香料,形成别具一格的饮茶仪式,彰显出游牧民族对中原茶文化的适应性改造,营造出“同茶不同韵”的饮茶美学。

(二) 生产促融: 各民族协同参与黑茶生产

黑茶产业作为多民族共享资源禀赋的经济纽带,通过全产业链协同机制实现了各民族经济利益

共融。黑茶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茶叶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环节的协同发展,为各民族创造了海量的就业机会与丰厚的经济收益。在黑茶产区,各民族同胞积极投身于黑茶产业。汉族茶农专注于茶叶种植,少数民族同胞则在黑茶加工、运输、销售等领域大显身手,各民族均能从黑茶产业发展中切实受益。以湖南安化为例,当地构建汉族精耕和少数民族深加工的协同产业格局,汉族茶农依托精细化种植技术提升原料品质,如冷水镇建成万亩标准化茶园,良种覆盖率达95%;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则发挥传统制茶技艺优势,采用“七星灶烘焙”非遗工艺,使黑茶金花菌活性得到提升。2019年,安化县凭借黑茶产业助力15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生动诠释了“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的发展奇迹^⑨。2023年,安化全县黑茶综合产值突破280亿元,带动12.3万少数民族群众就业,人均年收入较2019年增长67%^⑩。而在湘鄂渝边区,则形成湖北恩施土家族种茶、湖南张家界桑植县加工、重庆秀山物流的“黑茶产业协作带”,共带动武陵山区23个民族村集体经济增长15%以上^⑪。这种经济利益的共享机制,让各民族深刻认识到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进而凝聚成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有力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协作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文化互嵌,催生各民族深度交融、和谐相处。例如,四川雅安藏茶延续“汉地制茶、藏区消费”传统,在川藏沿线设立27处文化体验馆,成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34];内蒙古开发黑茶衍生咸奶茶砖,年产量高达1.2万吨,覆盖80%以上蒙古族家庭^⑫,蒙汉合资企业通过“奶茶文化节”在合作中深化互动。从产业协作到文化互融,黑茶始终以跨越时空的在场者身份,见证并参与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真正的民族团结从不追求文化同质化,而是以差异共生为基点创造共同繁荣。黑茶产业通过差异化分工构建协作网络,以利益共享强化价值认同,各民族协同参与黑茶生产过程本身就彰显着民族交融的实践逻辑。在多民族协同生产的动态演进中,黑茶产业既转化为边疆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也成为人们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象化载体。

(三) 贸易促融:黑茶外销铺就交流之路

黑茶以其独特的耐储运和宜转化特性,在古代

跨区域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促进了经济互通和资源互补,更成为跨越地理阻隔的物质纽带,铺就了一条贸易促进融合交流之路。在唐宋时期,川藏茶马古道上,黑茶的篾筐包装工艺经过精心改进,通过提升编织密度和加强防水处理,克服了山地运输的技术瓶颈,使得黑茶能够顺利穿越崇山峻岭。清代创新的“千两茶”柱形制,更是通过优化空间利用率,大幅提升了马帮的运载效能,使安化黑茶得以跨越荒漠和雪山,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活化石”,构建起横跨亚欧的贸易网络。明清时期,黑茶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和欧洲。安化黑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引入欧洲后,迅速成为贵族竞相追逐的“东方神秘饮品”。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因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凝聚在一起”^[35]。韦伯也指出,“贸易发生于不同种族群体之间,而非同一部落或社群成员内部。在最古老的社群中,贸易是一种对外行为,仅针对其他部落”^[36]。因此中原与边疆民族正是因“茶马互市”的物质需求,才逐步突破地理阻隔开展跨区域的以茶换物的交易,共同构建起连接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纽带和文化桥梁。另一方面,斯威德伯格基于长途贸易资本化特征,认为长途贸易因其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从事该贸易的主体,并促进了不同层次的投资^[37]。而陕甘茶商正是借助“引票制度”(《清会典事例》),成功构建起一个庞大的贸易资本网络。在“引票制度”下,陕甘茶商凭借茶引或茶票合法贩运茶叶,形成了稳定的茶叶贸易链条。他们从湖南采购安化黑茶,通过茶马古道等路线运至西北地区,甚至远销至俄国及中亚等地,极大地促进了茶叶贸易的繁荣,至清朝道光年间,安化黑毛茶的销量已达3600至4000吨^⑬,其中超过一半是由陕西发放的引票。陕甘茶商借助引票制度搭建贸易之路,与各族人民以及西方国家的商人加强互动,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总的来说,官方互市与民间贸易共同见证了各民族、各区域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到贸易往来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盛大的贸易景象,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融。在当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安化黑茶借助迪拜世博会的平台,以贸易为纽带,将古代茶道所蕴含的包容性精神转化为促进现代文明对话的桥

梁,开拓出一条以对话交流、多元共生为特色的发展新路。黑茶作为媒介,不断深化不同地域、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了人文基础,铺就了一条包容、开放、合作的交流之路。

(四) 饮用促融:茶饮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茶饮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物质性媒介,历经千年实践完成了从物理发酵到精神融合的历史变迁。自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携茶入藏开创“茶乳交融”的饮食革新(《唐会要·卷一百》),至元代确立“三献之礼”的仪式规范(《饮膳正要》),黑茶饮用既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化见证,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场域。而各民族喝茶品茗的生活实践,同时也是民族团结、人情交融的过程,这一过程尤其凸显在少数民族的茶礼仪式中。蒙古族“三碗敬献”^[38](敬天、敬地、敬人)仪轨与中原礼仪存在高度契合之处。在那达慕大会等盛大民族活动中,奶茶更是随处可见。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相聚于此,共同品尝蒙古族奶茶,共享欢乐,这种共享奶茶的社交习俗,极大地拉近了各民族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为各民族交流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而这种共享奶茶的社交习俗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例如在2023年的锡林郭勒那达慕大会期间,奶茶共享仪式吸引32个民族逾10万人次参与^④,构建起跨民族情感联结的物理空间。而在藏族聚居区域,酥油茶已然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与社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在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携益阳团茶入藏后不久,文成公主将益阳团茶与奶酪一同煮饮,从而发明了酥油奶茶^[40]。从此以后,无论是阖家欢聚的温馨时刻、盛大隆重的节日庆典,还是喜迎贵客的重要场合,藏族同胞都会满怀热忱地敬上酥油茶。主人会选用精致考究的茶具,将酥油茶满满斟上,双手恭敬地赠予客人,客人则需双手郑重接过,先浅尝三口,随后将杯中剩余茶饮一饮而尽,以此表达对主人的敬重与感激之情。藏式“三次啜饮”^[41](首口敬天、次口敬地、三口敬人)这一庄重的献茶仪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民族性格,更在你来我往的互动过程中,极大地增进了彼此间的情感交流。由此可见,中原

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在黑茶饮用过程中持续交流碰撞、互相融合,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时各民族也在长期的文化濡化与涵化进程中,逐步构建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综上所述,安化黑茶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其特有的黑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茶文化天人合一、茶济民生、中茶自强、仁济同胞、以茶促融等丰富的精神意蕴。这些精神不仅是对安化黑茶发展历史的凝练,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入挖掘和弘扬安化黑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推动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加强民族团结以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安化黑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断创新发展模式,让安化黑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安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化县志(同治版)》。
- ② 数据来源:湖南省政府秘书处《湖南经济调查所茶业调查报告(1936年)》。
- ③ 数据来源: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安化黑茶产业白皮书(2022)》。
- ④ 数据来源:益阳市统计局《安化县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⑤ 数据来源:湖南省档案馆《民国湖南茶叶产销统计(1940—1949)》。
- ⑥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俄恰克图贸易档案汇编》。
- ⑦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西藏茶产业精准扶贫成效评估(2024年)》。
- ⑧ 数据来源:陈椽《中国茶叶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⑨ 数据来源:益阳市统计局《安化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⑩ 数据来源:安化县统计局《安化县黑茶产业经济贡献统计公报(2023)》。
- ⑪ 数据来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武陵山片区民族地区产业协作发展评估报告(2022)》。
- ⑫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内蒙古民族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白皮书(2023)》。
- ⑬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道光朝户部题本·茶课卷》。
- ⑭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2023年锡林

郭勒那达慕大会民族文化活动评估报告》。

参考文献:

- [1] 余悦. 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7): 7-18.
- [2] 徐子涵, 李张闽. 茶文化传播的数字化路径——以江苏溧阳茶文化的信息交互可视化传播实践为例[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2): 154-169.
- [3] 吕宛青, 肖钊富. 茶文旅耦合协调发展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云南省30个茶叶重点县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3): 78-92.
- [4]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湖南省区域地质志[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5: 213.
- [5] 刘仲华, 黄建安, 施兆鹏. 茶树根系生理特性与土壤适应性研究[J]. 茶叶科学, 2015, 35(2): 123-130.
- [6] 安化县茶叶局. 安化黑茶民俗谚语汇编[Z]. 2005.
- [7] 陈椽. 茶叶储藏学[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5: 78-82.
- [8] 陈祖槩.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1.
- [9] 刘仲华, 黄建安. 冠突散囊菌在黑茶渥堆发酵中的作用机制[J]. 微生物学报, 2011, 51(6): 742-748.
- [10] 陈宗懋. 中国茶经[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2.
- [11] 安化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千两茶踩制技艺传承谱系[Z]. 2016: 15-18.
- [12] 朱自振, 沈冬梅.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5.
- [13] 王威廉. 唐代潭州茶区地理考辨[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3, 28(2): 45-52.
- [1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九十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9705.
- [15] 安化县文物局. 宋代安化茶务碑刻集释[Z]. 2015.
- [16] 湖南省商会. 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1911年)[Z]. 长沙: 湖南省档案馆藏.
- [17]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安化黑茶产业扶贫模式典型案例[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18]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19] 脱脱. 宋史·食货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0] 明孝宗实录[M]. 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 1962.
- [21] 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M]. 宣统二年木刻本: 卷6.
- [22] 湖南省档案馆. 湖南省抗战史料汇编·财税卷[A]. 2015.
- [23] 湖广通志: 卷四十二·食货志·茶课[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215-218.
- [24] 彭先泽. 安化黑茶砖生产技术报告[R]. 安化: 湖南省安化茶场, 1941.
- [25] LIU ZHONGHUAL. Proteomic analysis of Eurotium cristatum reveals key enzymes in metabolic pathways during Fuzhuan tea fermentati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21, 69(15): 4415-4424.
- [26] 蓝勇. 中国茶马古道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 [27]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8] 汤显祖. 玉茗堂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9]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保证边销茶生产的指示(1953年2月)[Z]. 北京: 中央档案馆藏.
- [30]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调整砖茶生产布局的决定[Z]. 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档案, 1953.
- [31] 湖南省益阳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益阳地区志·工业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342-345.
- [32] 蔡巴·贡噶多吉. 红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第7章.
- [33] 陈宗懋. 中国茶叶大辞典[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
- [34]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川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Z]. 2023.
- [35]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56-57.
- [36] 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36.
- [37] 斯威德伯格. 经济与社会: 经济行动的社会学分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78.
- [38] 罗布桑却丹. 蒙古风俗鉴: 卷三·饮食礼俗[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 [39] 王尧. 吐蕃金石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40] 才让. 藏族茶文化考[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曾凡盛